



軍事戰略

毛澤東時期中共 的對外政策

助理教授 李明正

提

要

中國自鴉片戰爭後，受到來自西方列強的壓迫，一度淪為強權瓜分的對象，百年屈辱成為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振興中華的歷史使命，從清末的自強運動、百日維新到民國的五四運動、廢除不平等條約，都象徵中國力爭圖強的努力及反省。1949年中共建政，受到此歷史遺緒的影響，民族自尊、擺脫強權，自然成為對外政策的首要考量，不過也因此造成國家利益的受損。毛澤東時期中共的對外政策，正可反映出此種思維的外交政策。

壹、前言

所謂外交(Foreign Affairs)，是指一個國家廣義的對外聯繫與事務，也包括狹義的「外交」(Diplomacy)，即外交部門的體制與操作，但範圍更加寬廣，包含外交體制、外交思想、國際交往、國際戰略、國際觀念等。^{【註1】}一般來說，外交政策應以理性作為前提，並從國家利益著手。然而受到中國百年屈辱的歷史影響，中共在建政初期，一直以擺脫以往舊中國，成立主權獨立新中國自許，因此對外關係常出現情緒性的決策，加以毛澤東個人性格影響，至毛澤東去世之前，中共對外政策大致呈現政治掛帥，意識形態治國的決策方式。

經歷了30年的政治動亂與國際對抗，雖然使中共擺脫國際介入的陰影，為了強調民族自尊及主權不容侵犯，甚至與當時的美國與蘇聯武力相向，然而也因此付出

註1 王逸舟，〈論中國外交轉型〉，《學習與探索》，2008年第5期，頁57。



慘痛的代價。本文將以毛澤東時期的國內外環境來分析當時中共的外交政策，在經歷不同的時空背景，其外交大致分為一邊倒、反美反蘇及聯美反蘇三個階段，本文將依序分析。

貳、一邊倒

1949年，中共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共同綱領》，它用法律的形式規定了中共外交的基本原則和政策，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一邊倒」。周恩來對這三句話曾解釋說：「另起爐灶」就是指「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係，而要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另行新的外交關係。」「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是指「帝國主義總想保留一些在中國的特權，想鑽進來，我們要在建立外交關係以前把屋子打掃一下」「一邊倒」是指「宣佈了我國站在以蘇聯為首和平民主陣營之內」^{【註2】}前兩項政策其目的在於與國民政府的對外關係劃清界線，在新舊政權交替，尤其是以武力獲取政權的中共來說，應是必然的選項。而「一邊倒」則決定中共建政在外交政策上的布局與立場，在外交政策的規劃上處於核心的地位，政策形成的主要考量大致來自國內外及領導者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

在國外因素方面，中共於1949年末建政後，當時美蘇兩國所主導之冷戰兩極局勢已經成形，美國雖在1949年8月發表對華白皮書撇清與國民黨的合作關係，強調美國對戰後中國的情勢已儘力而為，情勢發展不如人意，應由國民黨政府自己負責。以此表明在中國內戰上的中立立場，以確保未來在對華政策上的戰略彈性。然而，受制於美蘇對抗的戰略考量及意識形態的差異，美國對中共的態度並不友善。如1949年11月，在美國的主導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成立了一個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封鎖和禁運的國際組織，其中有專門的中國委員會，作為對中國大陸禁運的執行機構，屬於禁運的產品有尖端技術產品，軍事武器裝備和稀有物質三大類，禁運種類有1000多項。^{【註3】}可說明，美國雖然對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有所不滿，然而並未積極向中共靠攏，仍對中共充滿戒心。

就中共來看，在建政後最重要的是得到世界主要國家的國際承認，以取代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面對當時美蘇對峙敵我分明的國際格局，投向美國或蘇聯主導的陣營，的確是中共建政初期在外交上重要的選擇，相對於美國在立場及態度的模糊

註2 周恩來，《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頁48-80。

註3 陳有進，《當代世界大事縱覽（1945-1990）》（上海：改革出版社，1991年），頁96。



曖昧，蘇聯則較為明確，正可滿足中共獲得國際各國承認的外交需要。而毛澤東對當時的國際形勢亦知之甚詳，在中共建政的前夕，在其《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即明確提出：「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我們必須一邊倒……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註4】}基於美蘇對抗的戰略需求，蘇聯對中共展現極大的誠意，在中共開國大典的第二天，就正式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在蘇聯的帶動下，保加利亞、匈牙利、北韓、波蘭、羅馬尼亞和捷克等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都很快承認了中共政權，並先後與中共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在國際政治上予以極大的支持，解決了建政初期，國際社會對中共的承認問題。^{【註5】}在其政權成立不到一年的時間，就有17個國家相繼與中共建立了外交關係，其中既包括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也有瑞典、丹麥等非社會主義國家。此外，英國、挪威、荷蘭、巴基斯坦等8個國家，也已經表示願與中共建立邦交或正與其進行建交談判，^{【註6】}對中共國際地位的提升有其正面的影響。

在國內因素方面，中共建政之初，新的政權急需鞏固，遭受長期戰爭蹂躪的國民經濟有待恢復，當時國家內部不安定的政治勢力仍未整合完成，對中共來說，利用一切可資利用的國家資源，爭取政權的鞏固、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恢復，是此時期中共國家戰略的核心。面對西方世界的敵視和封鎖，具有同一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蘇聯無疑成為中共結盟的最佳選擇。蘇聯不僅具有超級大國的實力和地位，而且與中共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關係。^{【註7】}

而蘇聯的確也成為中共在建政初期國內經濟及各項建設最重要的援助者。據統計，從1950年到1957年6月，中共從蘇聯共得到4343套技術資料，在此期間，蘇東國家向中共派遣許多專家，提供大量的技術知識，到1955年1月1日，在中國大陸蘇聯技術專家達800人，顧問500多人。與此同時，中共派遣大批的實習生、留學生到蘇聯等國學習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僅在1955年就派遣了留學生1890人。此外，中共還派遣一些專家到蘇聯的冶金、機械、煤炭等生產部門進行考察、取經，並成立了中蘇科技合作委員會，與蘇聯定期互派科研人員，進行學術交流與專題科

註4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473、1475。

註5 李政敏，〈略論建國初期毛澤東「一邊倒」的外交策略〉，《陝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頁158。

註6 趙豔霞、聶玉寬，〈試析「一邊倒」與中國獨立自主外交〉，《哈爾濱學院學報》，第29卷第3期（2008年3月），頁46。

註7 柳德軍，〈國家大戰略的碰撞與五十年代中蘇關係的惡化〉，《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第9期，頁178。



學研究。【註8】

其中在軍事科技的援助上尤為明顯，加以韓戰爆發的戰爭需求，對中共空軍、海軍的發展有其重要性。在空軍建設過程中，建政初期，雖然中共已成立空軍，然而不論在飛機及人員技術上皆處於落後及不足的狀況。蘇聯不僅提供飛機、航空技術，還派專家、顧問到中國大陸指導，派教員到中共航校上課。在海軍建設方面，1953年6月，中蘇簽訂了海軍協定，即「六四協定」。根據這項協定，中共向蘇聯購置了護衛艦、潛艇、掃雷艦、大型獵潛艇、遠航魚雷快艇等五種型號艦艇的全部技術圖紙和一批材料、設備，這對於海軍的裝備建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為中共自行製造海軍戰鬥艦艇打下了重要的基礎。【註9】

另在經濟援助上，1950年，蘇聯向中共提供3億美元的貸款，當年中共用這筆貸款提供建政後第一批大型工程項目50個，協助中共國民經濟最重要部門的恢復和改造工作。1953年，中蘇簽訂了關於蘇聯援助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協定和議定書，蘇聯承諾援助中共新建或改建91個規模巨大的工程項目，其中包括鋼鐵聯合企業、機器製造廠、汽車製造廠、拖拉機製造廠、電力站等。1954年10月，中蘇又簽訂了關於蘇聯援助中共新建15個工業企業和擴大原有協定規定的企業設備供應範圍的議定書。至此，加上蘇聯以前同意援助的50個和91個大型項目，蘇聯向中共提供的援助項目共156個，這些專案是中共在20世紀50年代中前期工業建設的骨幹企業，對中共的工業化進程發揮了重大作用。【註10】

在經濟貿易上，蘇聯及東歐國家也是其主要的夥伴，1950年中共與蘇聯及東歐國家的貿易在中共對外經貿總額中的比重僅為26%。1953年上升為70%，1956年上升為75%。與蘇聯及東歐國家的貿易已成為中共對外貿易的主要部分。【註11】另外，蘇聯協助中共制定「一五計畫」，有效地加快中共恢復國民經濟和建立工業化基礎的速度。可以說，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援助，對剛建立政權的中共打破了美國的封鎖禁運，並對奠定中共國民經濟的基礎及後來開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都起了重大作用。【註12】中共總理周恩來即指出：「蘇聯政府慷慨無私的援助，使我們能夠順利的鞏固國防，戰勝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並使中國的經濟恢復工作取得迅速的成

註8 王駿，《毛澤東與中國工業化》（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328-329。

註9 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頁95。

註10 李久林，〈新中國選擇「一邊倒」戰略及其實踐效應〉，《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頁104。

註11 黎青平，《毛澤東鄧小平與對外開放》（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頁48。

註12 舒建國，〈毛澤東一邊倒外交戰略的內涵及其實踐效應〉，《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0卷第1期（2009年1月），頁15。



功。新中國堅持自力更生，在蘇聯的援助下，全面學習蘇聯經驗，建立起了獨立和完整的工業體系。沒有這種工業基礎的支撐，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不可能取得這麼大的成就的，也不可能很快的提升自己的出口結構。」【註13】

在意識形態方面，意識形態是影響國家外交決策的重要因素。外交決策是一國在採取正式的外交行動之前面對多種不同的選擇所做出的決定。從根本上說，國家外交行為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是國家利益。但思想是行動的先導，一國採取何種外交政策不僅取決於國家利益，而且與決策者的意識形態有著密切關係。因為決策的過程受決策者價值體系的制約，一定的價值體系決定決策者的態度、信仰和原則，政治意識形態對決策有直接的或間接的制約作用，一定的公共政策總是帶有一定的價值觀念的。【註14】

意識形態是人們對世界和社會的總的看法和觀點，它就潛移默化、先入為主地決定了決策者觀察世界、判斷是非、處理資訊、做出決策時較為固定的認知框架。因此外交決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意識形態，特別是主要決策者的意識形態的影響。不僅如此，意識形態中的信仰、價值觀和理想等範疇還程度不同地影響到決策者對國家利益的判斷並最終成為國家利益的組成部分。【註15】在意識形態上，中共與蘇聯可說系出同源，雙方關係極為密切。中共自從1921年在上海成立，即受蘇聯所主導之國際共產所領導，並指示各種路線及政策，而中共領導人中也有人曾至蘇聯受訓，在意識形態上受蘇聯影響極大，可以說中共是吃蘇聯共產黨奶水長大的，雙方意識形態有其親近性。基於此種淵源及歷史背景，中共於建政初期與蘇聯政治結盟實不足為奇。

基於以上三個面向的考量，中共在建政初期與蘇聯建立了極為鞏固的政治同盟關係，共同對抗美國所主導的西方陣營。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促使中蘇的戰略合作關係更為密切，在韓戰期間，蘇聯提供大量的步兵用武器、大砲、裝甲車、卡車、戰鬥機、轟炸機、潛艇、驅逐艦及炮艦等，蘇聯顧問參照蘇聯模式，協助共軍發展國防工業及飛機、武器製造廠及造船廠之建造。直到1950年代末期，中共已經生產出各式蘇聯設計的軍事裝備。【註16】因應來自蘇聯與中共的威脅，美國分別與

註13 康偉、郝琦，〈建國初期毛澤東一邊倒外交政策的新思考〉，《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1期(2009年2月)，頁39。

註14 王滬寧，《比較政治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143-144。

註15 張郁慧，〈向蘇聯「一邊倒」外交決策中的意識形態因素〉，《西伯利亞研究》，第33卷第3期(2006年6月)，頁80。

註16 Kenneth W. Allen, Glenn Krumel, and Jonathan D. Pollack, China's Air Force Enters the 21st Cen-



菲律賓、日本，南韓及中華民國締結軍事盟約外，還與澳洲及紐西蘭簽訂美澳紐安全條約，另外並促成東南亞公約的成立。從1950年到1959年，中共與蘇聯共同對抗美國的地點包括朝鮮半島（韓戰）、臺灣海峽（1954與1958年兩次危機）以及東南亞（越戰）。【註17】

雖然中蘇兩國因戰略需要相互結盟，也獲致一定的合作成果，在緊緊相鄰的地緣條件上，兩個大國逐漸產生權力結構上的矛盾。一個是自許老大哥並高高在上的蘇聯，一個是遭受百年屈辱，極力擺脫強權介入的中共，註定兩國走向分道揚鑣的命運。雙方的紛爭出現在史達林（Joseph Stalin）過世後，蘇聯新領導人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批判史達林的事件上，1956年，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對史達林個人崇拜的批判和「三和」路線的提出，使毛澤東認為，赫魯雪夫在史達林的問題上自揭瘡疤，或在其他事關共產主義未來命運的問題上，只講緩和與和平，不講革命與戰爭，是向資本主義世界示弱的一種表現。因此，他認為赫魯雪夫已經丟掉了革命的精神，中國共產黨應當在推動世界革命的問題上發揮某種指導的作用。

【註18】

雖然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使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為之震動，然而，由於這一時期中蘇兩國均執行著比較穩健的內外政策，因此，蘇共二十大兩國雖有歧見，但並未影響雙方之間的友好關係。期間中共領導人仍協助蘇聯處理與波蘭的衝突、解決匈牙利事件以及支持召開莫斯科共產黨會議等。另外，蘇聯在經濟和軍事領域也不斷加強對中共的援助，特別是在1957年10月15日中蘇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承諾在發展原子能工業和核武器方面向中共提供援助。【註19】

然而，這次紛爭卻也為中蘇雙方合作的緊張關係留下伏筆。1958年春夏，中蘇之間發生了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事件，毛澤東認為，蘇聯提出在中國大陸建立長波電臺、建立兩國共同潛艇艦隊這兩個要求嚴重侵犯了中共的主權。【註20】雙方衝突加劇，1959年6月蘇聯片面撕毀核子合作協定。同年8月，蘇聯在中共與印度的邊界衝突中偏袒印度。蘇聯這兩項行動引起中共強烈反彈，雙方關係急轉直下。【註21】1960年7月，蘇聯決定撤回所有在中國大陸服務的專家並廢除雙方多項經濟合

tury (Santa Monica: RAND, 1995), p. 14.

註17 李登科，〈五十年的中（共）、美、蘇（俄）關係〉，《中國大陸研究》，第42卷第10期（1999年10月），頁46。

註18 柳德軍，〈偶然與必然：對長波電臺及聯合艦隊事件的新詮釋〉，《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5卷第4期（2008年7月），頁72。

註19 柳德軍，〈偶然與必然：對長波電臺及聯合艦隊事件的新詮釋〉，頁70。

註20 毛澤東，《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頁330。



作協議，共撤回1390個科技專家，撕毀343個專業合同，廢除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不僅導致中共許多重大工程建設停頓，亦嚴重阻礙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雙方的爭議更趨激烈，同盟關係已名存實亡。【註22】

參、反美反蘇

在1960年蘇聯將所有援華人員及物資撤回後，中蘇關係正式決裂，中蘇關係的破裂，使牢不可破的戰略同盟演變成了威脅國家安全的敵人；中共與其他大多數原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惡化，以往建立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關係，被赤裸裸的軍事對抗取代了。中共的主要敵人從一個變成兩個，即蘇聯和美國。中共不得不實行南反美帝，北抗蘇修的策略，陷入了在兩條戰線作戰和用「兩個拳頭打人」的被動境地。【註23】

1960年代，中共在對外關係上進入反美反蘇的時代，又稱革命外交，所謂革命外交，其實就是這種階級鬥爭觀念的產物。其最簡單的邏輯，就是按階級關係來將世界一分为二，即一方面是代表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與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或人民民主國家；另一方面就是代表資產階級和封建反動勢力的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帝國主義國家，非此即彼。而依據統戰思維，即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和打擊反動頑固勢力的邏輯來劃分。【註24】

此種外交觀點可回溯毛澤東在1945年中共七大所做結論和他在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士·斯特朗談話中的說法，即將世界分成三類矛盾，即第一是帝國主義國家中統治者與本國無產階級及其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第二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或帝國主義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第三是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間的矛盾。按照這類矛盾的分法，則可以發展各國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革命力量，爭取和中立與主要帝國主義矛盾衝突的各種中間力量，在全世界組成統一戰線，著重孤立和打擊對自己威脅最大的最反動的帝國主義力量。【註25】

在此思維下，發展中國家成為毛澤東急欲拉攏稱霸中間力量，為了能在發展中

註21 O. B. Borisov, B. T. Koloskov, *Sino-Soviet Relation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5), pp. 129-135.

註22 鄭碩宇、石志夫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史稿》（香港：大地圖書有限公司，1994年），頁288-292。

註23 何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理論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外交戰略調整〉，《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4期，頁17。

註24 楊奎松，〈新中國的革命外交思想與實踐〉，《史學月刊》，2010年第2期，頁74。

註25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103。



國家取得龍頭地位，毛澤東陸續提出「中間地帶」與「三個世界觀」，把全球劃分為第一世界美蘇兩霸；第二世界西歐、日本等次等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第三世界一泛指發展中的國家。毛澤東並以中國大陸仍處於發展之中，在衡量自身的國力、人口、領土的大小後，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統一戰線是中共可以基本倚靠的力量。^{【註26】}尤其面對二戰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紛紛擺脫殖民統治的國際環境，1960年代達到高潮。僅1960年，非洲就有喀麥隆、多哥等17個國家取得獨立，這一年因此被稱為「非洲獨立年」。1961年的「不結盟運動」、1963年非洲統一組織的建立、1964年「七十七國集團」的問世在國際舞臺扮演了比較重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毛澤東。^{【註27】}

1963年9月28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理論：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包括日本、加拿大。這兩部分都對美國不滿意，他們之間的鬥爭「是控制和反控制的鬥爭」。三個多月後，毛澤東在與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聽濤克已談話時再次指出：「中間地帶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廣大經濟落後的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兩部分都反對美國的控制。在東歐各國則發生反對蘇聯控制的問題。」^{【註28】}

為了配合與美蘇等國的長期鬥爭，196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作出了「注意國際局勢的發展，準備打仗，在長遠規劃中首先要搞好戰略佈局，加強『三線』地區建設」的重大決策，提出「三五計畫必須立足於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因而，在1964至1968年間，三線地區建設的投資達482.43億元，佔基建投資總額的52.7%。按照「山、散、洞」原則進行佈局的「三線建設」，不僅造成了重大損失和浪費，而且打亂了國民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正常秩序。^{【註29】}

由於中共強烈的革命姿態與強烈的反蘇修政策，對蘇聯日益構成挑釁，迫使蘇聯不斷在中蘇共邊境增強軍力，而使中共安全在南北軍事雙重威脅下日益陷入困境。中蘇關係的惡化誘發了兩國一系列矛盾衝突。從1960年8月中蘇在新疆博孜艾格

註26 金正昆，《現代外交學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69。

註27 郭兵雲、卓旭春，〈「兩條線」外交戰略形成的原因探析〉，《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頁90。

註28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44。

註29 舒建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兩條線」外交戰略的得失與啟示〉，《江西社會科學》，2008年第7期，頁137。



爾山口附近地區的邊境衝突起，兩國之間的邊界糾紛便不斷發生。根據中共的聲明，1960年至1964年9月，由蘇方挑起的邊境事件達1675起。^{【註30】}從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僅由蘇方挑起的邊境事件就達到了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間增加了一倍半。^{【註31】}

尤其在1968年，蘇聯軍事鎮壓捷克，並宣佈「布里茲涅夫主義」(Brezhnev Doctrine)，宣揚蘇聯干涉社會主義成員的合法性，更挑動中共敏感的政治神經，此舉無疑震動了內政外交困難的中共。^{【註32】}隨後於1969年3月，爆發「珍寶島事件」，雙方在東北邊界兵戎相見，同年6月布里茲涅夫(Brezhnev)提出「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註33】}的構想，緊接著7月尼克森(Nixon)宣佈「尼克森主義」(Nixon Doctrine)^{【註34】}之後，中共對外來威脅認知的改變，促使了它把敵人主次的順序予以調整。^{【註35】}

肆、聯美反蘇

中共聯美反蘇政策，主要基於蘇聯的威脅及美蘇對抗下美國欲打中國牌之兩大因素所造成。在蘇聯威脅方面，自中蘇兩國在20世紀50年代末決裂後，雙方衝突越演越烈，終於在1969年3月，兩國邊防部隊在珍寶島爆發了流血衝突。1969年珍寶島事件後，蘇聯提出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倡議，試圖與亞洲的一些國家建立起所謂「安全合作關係」。1971年8月，蘇聯與印度簽訂了《和平友好合作條約》，在涉及第三國的條款中約定，在任何一方遭到進攻或進攻威脅時，雙方進行協商並採取有效措施來保證兩國的和平與安全；1978年11月，蘇聯又分別與越南和阿富汗簽訂了含有同樣條款的條約。在此之前，蘇聯還曾於1966年1月與蒙古簽訂了《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上述條約都帶有軍事同盟性質，根據這些條約的規定

註30 李丹慧，〈1964年：中蘇關係與毛澤東外患內憂思路的轉變〉，樂景河主編，《中俄關係的歷史與現實》（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557-574。

註31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人民日報》，1969年5月25日。

註32 張雅君，〈四十年中共外交政策實踐的評估〉，收錄於張煥卿、段家鋒、周玉山主編，《中國大陸研究》（臺北：三民書局，1991年），頁397。

註33 布里茲涅夫提出「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最重要的目的有二：1. 利用美國勢力退出亞洲地區，趁機擴張；2. 針對中蘇共邊境衝突，意圖圍堵中共在亞洲擴張勢力。為了配合這兩項目標，當布里茲涅夫宣告他的構想以後，蘇聯在亞洲地區的海軍活動日漸加強，此種來自蘇聯的威脅使中共的危機感加深。參考黃天中、潘錫堂，《中國大陸研究》（臺北：五南出版社，1994年），頁148。

註34 「尼克森主義」為美國因為在越戰中失利，因而作出國際戰略的調整，1969年7月美國總統尼克森在關島發表美國武裝部隊將避免介入亞洲大陸戰爭的聲明，是為「尼克森主義」。

註35 黃天中、潘錫堂，《中國大陸研究》，頁85。



，蘇聯勢力大舉進入蒙古、印度、越南和阿富汗等國，就中共看來，雖然打著「集體安全」的旗號，事實上無疑是對付自身的軍事聯盟。【註36】

在美蘇關係方面，當時兩極格局中美國相對實力的下降也是促成中共外交戰略調整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美國陷入越南戰爭，國內反戰情緒高漲，同時，由於西歐、日本經濟形勢的好轉，美國實力相對而言更趨下降之勢。在美國衰退的同時，蘇聯呈現出了擴張的態勢，並且不斷增強軍事力量，將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投入到國防建設中，使美蘇的軍事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在戰略核武器方面：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前夕，美國擁有294枚陸基洲際導彈和1000多架戰略轟炸機，而蘇聯只有75枚陸基洲際導彈，戰略轟炸力量也很薄弱。1965年至1969年，美國的陸基洲際導彈由854枚增至1054枚，蘇聯則從270枚迅速發展到1054枚，戰略核武器數量接近了美國，而且蘇聯擴充核武器的勢頭依然強勁。而在常規軍事力量方面，蘇聯甚至超過美國。【註37】另外在工業生產方面，據統計，1950-1955年間，蘇聯國民收入僅為美國的27%，工業生產總值只佔美國的20%，到1966-1970年間，這一比例分別達到51%和54%。【註38】進入20世紀70年代，伴隨兩強軍事實力和國力對比的變化，其爭霸局面逐漸由美國佔優勢向美守蘇攻轉化。

面對局勢的轉變，在1969年中共九大前後，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周恩來指示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中共元帥，由陳毅領導研究國際問題，為中央決策提供諮詢。在分析當時國際形勢的前提下，四位中共元帥認為：「在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中，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蘇美矛盾大於中蘇矛盾；針對中國的戰爭目前還不會輕易發生；在目前蘇美兩國都急於打「中國牌」的情況下，中國處於戰略主動地位。」【註39】

對於中美在戰略上的合作，美國基於蘇聯的威脅日趨嚴重。在國際環境不利的背景下，聯中制蘇在戰略上有其利益，在當時條件下有成功的要素。美國方面認為，中共早已與蘇聯交惡，且長期處於孤立境地，此時美國發出善意訊號之後，中共必然走上與其聯合的道路。【註40】因此，在珍寶島事件發生後，美國總統尼克森頻

註36 廖心文，〈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鄧小平等打破蘇聯包圍的戰略思想與決策歷程〉，《黨的文獻》，2010年第6期，頁36。

註37 王思宇，〈淺析「一條線」外交政策出臺的原因〉，《南方論刊》，2011年第1期，頁69。

註38 徐成芳，〈和平方略—中國外交策略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年），頁158。

註39 何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理論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外交戰略調整〉，頁17。

註40 劉涵，〈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國外交戰略轉型原因新探—新古典現實主義視角下的分析〉，《法制與社會》，2010年第35期（2010年12月），頁145。



頻對中共釋放和解的善意，促使中共領導人意識到了改變過去那種處處與美國為敵的激進政策，從而聯美反蘇以改變自身困境的可能性。從此，中共國際戰略思維發生變化，逐漸放棄「世界革命」的觀念，中共的對美外交政策開始從革命外交向務實外交過渡。【註41】

可以說，1969年，中蘇在珍寶島的衝突，是讓毛澤東意識到國家安全的最主要威脅是來自於蘇聯的主要因素，因此在戰略上做了重大的轉變，拉攏了過去的主要敵人美國以應付新的主要矛盾。這也意味著，中共與西方國家在國際上的制度的接軌。中美關係戲劇性變化引起了連鎖反應。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恢復中國代表權的決議，接著又出現了與中共建交的高潮。中共不僅迅速與40幾個亞非拉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而且同亞洲的近鄰日本和西歐的所有主要國家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中共同東歐各國的關係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註42】其中尤其是與西方國家關係的重大變化最為關鍵。如1972年3月中旬，中英之間自1954年建立起的代辦級外交關係升格為大使級關係。另外，中共與荷蘭、希臘、西德等國家相繼正式建交或實現外交關係升格。隨後，中共也與日本邦交正常化。僅1972年一年，中共就先後與包括日本在內的18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或實現外交機構升格。【註43】

進入聯合國後，中共的邦交國家數目大增，與國際的交往日趨密切。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為兩國關係正常化奠定了基礎，中共的外交形勢轉向務實與有利。基於國際局勢的改變，毛澤東提出「一條線」、「一大片」，所謂「一條線」、「一大片」，是指包括美國在內，與中共大致處於同一緯度線的國家結成一個遏制蘇聯擴張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線。這一外交戰略構想是毛澤東在1973年2月會見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時提出的，他說：「我跟一個外國朋友說過，我說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蘭、土耳其、歐洲，並團結這條線周圍的『一大片』國家，共同對付蘇聯的擴展。」【註44】

雖然中共與美國為對抗蘇聯達成戰略結盟，然而在毛澤東的心裡，仍將美國與蘇聯劃為第一世界，以此區別美國與中共在國際位置的不同。如1974年2月，毛澤

註41 栗廣、栗智，〈從革命外交到務實外交—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對美外交政策的演變〉，《廣東教育學院學報》，第30卷第2期(2010年4月)，頁19。

註42 章百家，〈從「一邊倒」到「全方位」—對50年來中國外交格局演進的思考〉，《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1期，頁27。

註43 廖心文，〈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鄧小平等打破蘇聯包圍的戰略思想與決策歷程〉，頁40。

註44 鄭謙，《毛澤東與鄧小平》(長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頁327。



東在同尚比亞總統卡翁達(Kenneth Kaunda)談話時提出「三個世界觀」，他指出：「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美國、蘇聯原子彈多，也比較富。第二世界，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原子彈沒有那麼多，也沒有那麼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註45】}戰爭與革命的時代主題下，第三世界還是中共最堅定的盟友。

可以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中共對時代主題的認識是「戰爭與革命」。毛澤東於1940年指出：「我們是處在戰爭和革命的新時代。」中共建政後，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1969年4月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以及1970年的「520聲明」中都提到了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性。1973年8月，中共十大政治報告也指出：「我們仍然處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1976年兩報一刊(兩報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一刊指《紅旗》雜誌)元旦社論仍指出：「世界各種基本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和戰爭的因素都在明顯增長。」顯然，一直到1970年代中後期，中共仍將認定當時的時代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而其主要特徵與時代主題為戰爭與革命。^{【註46】}

綜合以上分析，雖然基於戰略的需要，中共推出聯美反蘇的對外戰略，然而，終毛澤東之世，中共都沒有改變這種以意識形態出發的國際體系秩序觀，毛澤東是一意識形態狂熱份子，極端相信矛盾的運用與以多勝少的「統一戰線」，更漠視權力對比的國際現實。^{【註47】}毛澤東對整體國際形勢的基本論斷仍然認為資本與社會兩大陣營必將發生一場戰爭，因此其外交的基調仍是戰爭與革命，對於現存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採取對立與反對的態度。^{【註48】}

伍、結論

終毛澤東一生，其對外關係常圍繞在自我情緒及歷史遺緒中，從最早的一邊倒政策，全面倒向蘇聯陣營，與西方為敵，雖對中共建政初期的國際地位及國內技術提升及重建產生一定的效果，然而也失去與西方合作的機會，對中共來說未嘗不是

註45 毛澤東，《毛澤東外交文選》，頁600-601。

註46 尹占文、鄧淑華，〈戰略文化、國家行為與國際形象——對中國國際形象變遷的考察〉，《社會科學研究》，2009年第4期，頁71。

註47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頁289-292。

註48 邱坤玄，〈大陸外交政策演變概述〉，《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2009年第11期(2009年11月)，頁17。



一種損失。1960年在與蘇聯鬧翻後，竟情緒性的推行反美反蘇的革命式外交政策，加以國內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中共受到很大的傷害。1970年代後，因受到蘇聯的軍事壓力，中共推行聯美反蘇的對外政策，然而仍是以結盟式外交來尋求國家安全，其外交本質屬於對抗而非合作。

毛澤東的外交政策基本反映出中國受西方百年屈辱所追求民族自尊的反應，加以毛澤東的浪漫性格又使此種情況加劇。然而，畢竟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以理性計算為基礎，經過狂飆30年後，終歸要回歸外交常軌，理性計算國家利益，最為外交政策的最高準則，1978年中共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即是在經歷毛澤東時期政治狂熱後的反思，也才能創造中共目前的國際地位。近年臺灣因國內政治紛爭，在面對兩岸關係及國際外交，也常不能理性處理，毛澤東時期的對外政策正可作為歷史借鏡，值得深思。

作者簡介

助理教授 李明正

學歷：空軍官校67期、政戰學校政治學碩士、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博士，經歷：空軍官校軍學部教官、空軍官校通識中心社科組專任助理教授，現職：大仁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專任助理教授。